

四十自述
我在六十岁以前
我的半生

胡适著

马叙伦著

陈鹤琴著



旧籍新刊

蔡尚思题

岳麓书社

贺新郎

放眼春如许。却堪怜、三分春色，二分归去。任道浮生能百岁，半已匆匆虚度，算只为儒冠相误。一晌糊涂何用说，要从今料理前头路。无草草，重新错。情怀更与东风诉。有梅花、山围水绕，愿为渔父。不学磻溪垂钓者，只钓旂常钟鼓。得几尾、戈戈鮠鲋。换取布衣蔬食之，便收纶买醉斜阳渡。人与我，两无忤。

五十初度之作

贺新郎

又是十年去。叹十年、韶华如故，
鬓丝非故。蓦地风涛淹绿野，惊起鱼龙
无数，对锦陌铜驼不语。破碎金甌还待
补，愧深衣皂帽春申浦。望钟阜，空怀
古。 扪天梦里无凭据。且安排、藏
山之业，日亲蟬蠹。半亩梅边一溪水，
此计因循已误。怕斜照、渐昏江树。扶
竹闲吟归去也，又烟云杳渺知何处？浮
一艇，逐鸥鹭。

六十初度之作

我是生在中华民国前二十七年（前清光绪十一年，公元一八八四年）四月廿七日。（这是照新历推算的日子。）我的家庭历史是这样的：高祖是一位农夫。曾祖从绍兴搬到杭州，学做鞋子，是个工人，后来自己开起店来了，又是商人。祖父呢，三考出身，正路功名，在前清做京官二十多年就过世了。我的父亲当然承继书香，但只做得一个县学生员。

我五岁（实际不足四岁）那年的春天，有一天，我的父亲在内客堂中间摆了一张四方桌子，靠外一边缚上一幅红呢桌帷，桌子上摆了一副香炉烛台，为着给我破蒙，要拜孔夫子。给我破蒙的老师是头年（前清光绪十四年）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，俗称解元的山阴王会澧先生，这就可以晓得父亲对我的期望了。

王先生到了，簇新的礼服，映出他那样风神矍铄的仪貌。更从他的谈笑里，显着他的得意。因为他正要上北京去会试，似乎指顾间连中三元可以操券而得。

我的父亲自然也穿着礼服，先请王先生拜孔夫子，随后自己也拜，随后便叫我拜。我拜得真神气，王先生称赞了一番，父亲便向王先生行托付礼，彼此互拜了一回，随后父亲叫我拜老师

破蒙开始了，撤了香炉烛台，摆上硃笔砚台。一本罗泽南做的《小学韵语》，是浙江官书局刻的大板。官堆纸印得雪白，铺在

桌子左边。一个绿色花绸子做的书包，是四方的绸子，把三面向里摺起，再缝住了，便成了袋子，一面不摺的角上，用黑色绸子挖了一个如意，镶在上面，又安上一条红布带子。书包里面放着一块木板，大小和书包差不多，板的一面，四边刻着古式花样，无非双鱼吉庆、笔锭如意一类，中间直刻四个大字，如“福缘善庆”一类，这块木板的用意怎样，或者是古代所谓“叶”，为儿童学书用的；或者不过为书包质软，借此衬得硬些，以便儿童装书。

王先生当然衣冠端正，俨然人师地坐在上首，我就坐在左边。王先生指着《小学韵语》开首四句：“小学之道，海尔童蒙。（这句或者有些错误，记不真了。）蒙以养正，是曰圣功。”叫我随他的声音念。教不到三遍，我就自己会念了。我的父亲自然笑开了脸，王先生也向父亲叫恭喜。

以后就是父亲教我了，当然继续读完这本《小学韵语》。读书以外，只有写描硃字。我一写就很合式，父亲更是欢喜。

可是我家的生活，要靠父亲每月薪水收入维持的，所以父亲也不能准时地继续教我。后来几年，父亲因为我的两位堂兄要读书，请了一位萧山某先生来家，我也跟着读“大学之道”了。后来又换了一位塘栖劳先生。后来请不起先生了，把我送到邻居一位张先生家。张先生有学生十几个人，聚在一间小屋子里，真是一阵一阵老鸦叫个不休。好在我也不过随口乱叫，张先生也不过只要学生背诵得出，就算了事。

在张先生家读书的那年，我已十岁了，可是我还不过读到下孟（《孟子》三卷，下孟就是下卷），而且也不晓得里面说些什么，可是我的写字算写得相当好了。

这年十二月十二日（自然旧历）下午，我的大祸临头了。这时我刚刚在那里叫“梁惠王曰：晋国天下莫强焉”，我家一个老做妈妈来对我说：“履官（是我的小名），少奶奶（我的母亲）叫偌回去。”我早晓得父亲这几日病势沉重，听了，就把书包拿起，向

先生作了一揖回家了。走入父亲房里，在父亲床前对面坐了，只看着父亲。父亲叫我的母亲拿长生果给我吃，我接着就不觉眼中要滚下泪来，正举起手来要向眼上揩，父亲便朝里睡了，大约也不忍看我。这夜子时（十一点多钟），父亲就撒下了我们母子兄妹四个过世了。

父亲在日，我已没有幸运好好地读书，何况父亲过去了。但是我的母亲呢，偏偏要从他老十个指头底下养活我们的生命，还要叫我承继祖父的书香，并且对我说：“你爸爸没有得志，是他一生的恨事，你要替你爸爸争争气。”所以请了一位父亲的学生孙先生来教我们兄弟读书，但是也不过和张先生一样。

我十一岁的冬天，母亲给父亲办葬事，父亲的好友汤颐琐先生从苏州来会葬，便带了我回苏州。明年，汤先生就馆到温州去了，却替我请了一位刘先生来教我。这位刘先生单名叫题，是苏州阊门外一位医生（自然是中医），所以订明是早来晚归的。他老真会教书，每日早晨九点来钟，我和一个邻舍同学到了馆里，他老个别的替我们上新书，温旧书，新旧书都要能够背诵得熟了，再替我们讲解。我虽则懂得不得文法，却能了解书上说些什么。他老又叫我们写大字小字。末了是对课。这件事情，像是现在的造句子一类的意思，为做文的起码练习。那时做文，都是预备将来考试中秀才举人的，因为那时考试要做五言八韵的诗，诗是要讲对子的，所以从小就要来讲柳眼、桃腮、飞絮、游丝、青云、赤日、乱头风、长脚雨、红板路、白门潮，由一个字起到五个字，五个字能对，就成了一韵诗。譬如先生出个“一团蝴蝶梦”，我们对个“几处鹧鸪声”，便是写落花的一韵好诗了。

我当时只能对到三个字，但是他老出口，我就对上了。我那位同学天资比不上我，什么都落后，但是他后来也赶上我了。我们在三个钟头里把功课都做完了，他老真喜得要死，每日不到午时（十二点钟），他老便回去行医了。我们也觉得这个先生真奇怪，

尤其是我，向来一窍不通，一忽儿觉得读书很有意思了。

可是不幸的事又临到我的头上。不到三个月，汤先生从温州来信接家眷了，刘先生自然不去，我却跟了姨子（就是汤先生的夫人，是我母亲的盟妹）到温州。汤先生是有名的学者，俞曲园先生的学生，诗文都做得好。他老原想自己教我的，但是他老文酒应酬太忙了，每晚归来，已是“鱼更再鸣”，就没工夫教我了，却叫我读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。我觉得咯哩咯嗒，读都读不上口，哪里还记得上心，了解更谈不上，但是三五日里，汤先生要我背诵一回，我真叫苦了，因为真是背诵不上几句。这样一年，母亲惦记我了，叫我的叔父来接我回杭州。

我十三岁的正月间（旧历）回到杭州，母亲又替我请好了一位张先生，教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读书。功课是和苏州一样的，但是我依然得不到读书的味道。不到一年，我的家境也决不能够请先生了，就进了一个宗文义塾，在智斋里从胡诵清先生读书。那时一斋里学生程度高的文章满篇，低的还只是背诵对课。我当然在低的方面，但是我却私下向同学里的会做诗的学做五言试帖诗（试帖诗是应考试用的），自然做不成功，我也觉不得读书的味道。

一年以后，母亲因我的身体不好，叫我回家（原来住在塾里的）；在同巷的李伯伯家，从一位萧山人鲁六僧先生读书。还不是老方子的一贴药，仍旧叫我感不到兴趣，只是写字算越写得好了，因为我的父亲是书法有名的，所以大家也夸奖我。这年是中华民国前十三年（前清光绪二十五年），就是“戊戌政变”的后一年，李家请的鲁先生换了一位范成佐先生。范先生的教书，法子还是一样，可是活泼些，有一回事，却叫我大感兴趣。我有一个姓洪的同学，天资也和我仿佛，我们对背诵，往往要争先到先生面前。我坐得近先生些，当然容易先到，这一回，他逞我不备，早离了他的位子，但是我的眼快，便同时抢到先生面前了，因此他和我都背诵起来。范先生左右为难了，但是他老心里明白，我是后离

坐位的，他老就出题目了，叫我们都停止背诵，由他老挑出书里一句来，叫我们接着往下背诵。他老先对那位同学说：“你先背”，分明是照顾他的意思。他老就从《论语》里挑出一句：“不占而已矣”，那位同学却背不出。他老又向我说：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”，我立刻接上去背诵了。那位同学自然只得捧了书走，气得来几乎下泪，我却一面背诵，一面很得意的向那位同学笑。

这时，我对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算能了解他们文法的部分了，就请范先生教我做八股文。呶唔呶唔地读了几篇程文（就是模范文），却爱上了俞曲园先生《课孙草》里子路宿于石门一章的一篇，因为有这样四句：“草草杯盘，席上之残肴未撤；荧荧灯火，室中之旧榻犹存。”觉得描写得有趣，就也学做八股文了。可是只做到起股，就不懂往下怎样做了。

头一年秋季，一夜，明月在天，我从外面回家，遇到有人慌张得很，担了泥菩萨搬家。我很奇怪，听人家说，原来康有为学了外国人，要开学堂，清朝皇帝听了康有为的话，要废佛教，拿天下庙宇来办学堂，所以那些尼姑先着了急，趁夜里这样赶来带菩萨逃难。我在那时，耳里早经听着康梁变法的话，晓得变法是为什么。那时杭州已有了一个求是书院，是新式教育机关（后来的浙江大学堂、浙江高等学堂都是从他改的，现在浙江大学也设在他的遗址），我却还没有晓得。

这年夏天，才听说杭州办了一个养正书塾，是外国学堂的样子，还晓得我父亲的一位盟友宋澄之先生（也是俞曲园先生的学生）在这里面教书，我就向母亲说明了，要进这个书塾，母亲自然没有不答应的。

其实这种书院书塾都是不中不外不今不古，不过不得不叫他们做新式教育机关。养正书塾的程度，可以说是现在的初三三四年到高中的混合体。我进去的时候，里面有二班三班四班三个班头，二班学生不过六七个人，都会做满篇的文章，年纪也都在二十左右

了。我呢，入学考试仍就是背诵一回书，因我还不不懂做策论文，把我和同时进去和我一样程度的同学凑了一班，叫做新四班。

我在新四班里和萧山三个姓韩的同学算是一班的“翘楚”，其实不过能做一百来字长的策论。我在半年将完时候，星期做文，一连考上七次第一，第二第三就是两个姓韩的同学。不到年终考试，我和两个姓韩的同学便升入老四班了。我在老四班里不过一两个月，国文第一又往往轮到我的头上了，所以这年年终考试的结果，我就升到三班。

我升到三班时候，只有一个算学教员赵望杏先生，是在四班里也是他老教我们算学的，可是我对算学总是格格不入，一部《笔算数学》，做到命分就弄不清楚。好在那时还没有物理化学等科目，有的不过是历史地理英文。历史地理都无教科书，也是那时还没有编得出来，所以我们读的历史，是整部的《御批通鉴辑览》。地理是《水道提纲》，我对地理简直无从入门。英文呢，我对发音来得不准，而且很蔑视外国文，所以英文教员魏冲叔先生用尽方法引诱我。年考的时候，我的试卷稍稍像样，他老竟给我奖金。但是我总觉得这是鬼话，我一生的吃亏却在这里。

这时三班的历史教员是刚刚请来的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陈介石先生（名叫戴宸），他老的古文也做得好，我们初初并不晓得，只当是一位布衣布鞋的乡下老先生。他老一口温州话，我们初初也真懂不得，可是我占便宜了，因为我到过温州。虽则我在温州住了将近一年，实在没有和温州人正式接触，不过听听邻舍人家讲话，有了些印象，所以陈先生说出来，我倒觉得和“他乡遇故知”一样。我听了他老对历史上的议论，很感兴趣。他老因为言语不通，总是用笔来考问我们。他老不但“循循善诱”，还真懂得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的教法。我们经他几次的启发，没有不五体投地的归依他老了。我在三班半年终了，又升到二班，便和原在二班的各位同学并驾齐驱了。

这年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，北方出了义和团的乱子，欧美日本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皇太后皇帝都向西安逃跑了。那时杭州有三份上海报纸，是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、《中外日报》，但是我们书塾里只教员室有报看，我们那里敢进去。这位陈老师却常常把时事告诉我们。一日，他把我叫得去，告诉我联军进了北京，皇帝走了。我好像天向我头上压下来了，就号啕大哭。他老却不响，直待我哭得太伤心了，他才对我说，你不要哭，慢慢对你说。我听他的说话，好像基督徒相信《圣经》一样，晓得他老必定有个道理的，也就止了泪。他老说：“你去息息罢。”我内心还是凄凉着，也没有话说，就退出了。

后来他老并不怎样特别地告诉我什么，但是我们从他老讲历史里说到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的事，我们不知不觉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了。他老又叫我们在课外看《天演论》、《法意》和《伯牙琴》、《明夷待访录》一类的书，我们又不知不觉懂得须要革命了。因此我们考试文里也大变了色彩。

我在二班里，也是半年就和全班的同学一起升了头班。可是我苦了，因为他们的算学都是学微积了，而我连三角也学不好。英文也连造句还咯哩咯嗒，改学日文，又讨厌他总是鬼话。不过我在历史、国文、掌故（这门功课有些特别，大概等于现在的政治学里经济学里的概论，而又只限于中国历史以内，并且没有教本，只在《九通》里面自己摸索）方面的成绩，除了汤永和、杜士珍两位同学外，我总超过其他同学们，所以保持了在头班的地位。

我在头班半年不到，和汤杜两位同学的成绩又超过了其他同学，忽然把我们三个加了一个特班生的头衔，却仍在头班里读书，这是在前清光绪二十七年上半年。下半年书塾里又出新花样了，加设师范生六名。各班学生一班，各班取来的学生都是现在的初小一二年级，师范生呢，并非另开一班，也不增加教育科目，就是给我和汤杜两位同学，和还有周继善、叶诚然、龚寿康三位同学

(都是头班生)加了一个职务,叫我们去教备班学生,不过不算正式教员,所以特立这个名目。

我们在备班里,一面是教师地位,一面还是同学地位。我们对于这班里的小兄弟,真是看得和自己的兄弟一样。而我们的教法,不但用了陈老先生教我们的方法,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”,我们和他们真德谟克拉西。我们有时设了一个问题,反而自己退下讲台来坐在学生位子上,请他们里面自动要说话的上去互相质问辩难。所以他们也和我们亲热得要死。他们里面有一个杨崇英,是书塾总理的孙子,不过十二三岁,先和我在新四班里同学,他后来告退了,这时重复进来,他每次能够侃侃而谈。还有一个傅孟,也是了不得的。

这时,我们书塾里还没有体操,我们到求是书院里去看了一番,不胜羡慕之至,就由高级同学发起向总理上书,请求增加体操科目。起初总理以为这是不需要的,后来终究被我们的“绝妙好词”感动了,增加了体操。我对这事,倒大感兴趣,翻杠子,荡秋千,居然第二手。

我们又发起组织同学了,一个现在学生会似的组织,由我们几个高级同学来领导。虽则形式上很不完全,精神上倒很团结。我们几个人常常晚上到年级较低的同学宿舍里集合他们,作演讲辩论,很似现在的座谈会。

照例,每年端午、中秋、年底三个时间,要由杭州府、钱塘县、仁和县轮流来考试。他们拿了卷子回去,评定了次第,五名以前都有奖金。有一回轮到钱塘县,知县黄大华先生,倒是一个有学问的,可是他偏闯了一个乱子。他随意把我们升降了,头班的降到三班,四班的升到二班,平日成绩好的偏偏都落入次等。我们大哄起来,好在校方并不依照他的评定办理,我们却大家都不愿意接受他的奖金。说也可笑,一共也不过五六十块钱,我们却要办一个藏书楼了。汤尔和会刻图章,他就牺牲了石头一方,刻

了“皆大欢喜楼藏书”七个字，捺在买来的一些当时新出的课本书籍上。那时杭州出了一份线装书式的《白话报》，其实都是求是、养正两校的教员的作品。我们就定了几分，供给同学看看。

这时，我的十七岁光阴过完了，养正书塾也改为杭州府中学堂，我们六个师范生都要在明年（光绪二十八年）暑假毕业。校方原定派我和汤杜到日本去留学，我们约定去学陆军，学了回来就好革命。（后来汤尔和曾去日本，一度进成城学校。）可是将要毕业的前两个月，却给我们一个留学的根本打击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我们同学们合理的思想发展了，我们组织起来了，对于校方古典式的一切会表示不满。在历史上，学生一进了校门，除了工友们以外，都是师长，尤其是在四十多年前，师字是和天地君亲成了联系的，杭州人家家里往往供着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，便可以晓得师字的尊严，所以书塾里的职员，人人自以为师，个个自以为长。我们塾里一位学正先生（类似现在的庶务主任），真很神气，大家就把他做了攻击的对象，但是平常对他还是礼貌不衰。

廿八年清明时节，西子湖边，山盘翠髻，水皱青丝，柳似舞腰，桃如含笑，怎不逗起我们的春情。向来清明、立夏这些节日是放假的，这年却改了规则。我们向学正先生要求，请向监督（改学堂后总理也改叫监督）商量，仍旧放假。他说：“不行。”自然大家不高兴。我们几个师范生却有点不师范了。就和几个头二班里的同学请了假，溜到西湖上，除了几匹马，大家轻衫软策，游山玩水，好不赏心悦目。哪里晓得半路上碰着了学正先生，三名轿夫，一乘快轿，冲到我们马前，来个照面。彼此来不及招呼就过去了。这日晚上，我们就听见这位学正先生在那里和教员们说我们不遵规则，还形容我们两句话，是“扇子扬扬，马鞭挥挥”。我们想他也何尝守规则，大家就有了一肚子气。

一会儿到立夏节了，当然没有放假的希望，大家倒也不想出去。

一日，我们六个师范生正陪着陈老先生吃晚饭。（我们有特别权利在宿舍里开饭，请他老同吃。）忽听到楼下饭厅里那位学正先生的声音很高，还有拍桌子的声音。赶紧叫工友去看，他回来说：“邵师爷同傅少爷、徐少爷相骂，邵师爷坐得轿到监督屋里去哉。”我们赶紧下去一问，方晓得和这位学正先生同桌子吃饭的同学傅振绅（后来改名锐，字母退）、王孚、徐景清三位，吃饭时候谈天，被学正先生斥责了，所以争起来。我们晓得学正先生向监督那里一去，这三位同学定被严厉的处分了。向来我和汤杜两同学是被监督特别看待的，这时汤尔和因病睡在隔壁医院里，大家就推我和杜士珍也赶到监督家里去，好替那三位同学说说话。可怜，我们是一盏灯笼两条腿，怎样赶得过学正先生的轿子。半路上就看见“翰林院编修”的灯笼，晓得监督向校里来了，又急忙回身就赶。赶到了校里，只见全校的同学已布满了监督办公室外面院子里，好些教员都在监督办公室外面君子堂里，监督准备开除三位同学的学籍了。

我们几个高级的同学都急了，有什么办法？有什么办法？请总教习（陈老先生）来救救他们，就把陈老先生请来。他老一听要开除学生，便“怒发冲冠”，一口气跑进监督办公室，正碰着监督手拿硃笔要写开除条子（那时开除学生要监督亲笔用银硃写的）。他老迫不及待地向监督说：“不能！不能！”监督只是不理睬，他老更急得“先生，先生不能，不能！”监督才慢慢地说：“本监督自有权衡，该教员无得干豫。”他老的无明火自然烧起来了。便说：“那末我辞职了！”这句方说出他老的口，这时我们也混在君子堂里，所以听得明白，便吓得往院子宣布，总教习辞职了。就有潮涌似的声音：“陈先生辞职，我们也走！”大家聚起来商量办法，一面凑出钱来租一所房子，预备暂时安顿身子，一面做了一篇呈文，直到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（当时称为三大宪）那边去控告这位学正先生。第二天早晨大家向孔子牌位行礼而别。这样一来，校方就用分化我们的手段，用感情来抽回一小部分，我们六个师范生除了汤尔和在病外，也都被

开除了。可是监督写条子，不用硃笔而用墨笔，“以示优异。”后来我们还听得监督写开除我们的条子，还流了泪说：“我手里只造就了这几个人，偏还在我手里开除他们。”

说到我的革命思想，是发生在十六岁。那时，我读了王夫之的《黄书》，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和《明季稗史》里面的《扬州十日记》、《嘉定屠城记》一类的书，有了民族民权两种观念的轮廓，这年又碰上了义和团的事变，八国联军冲破了北京，就峻深了我的民族观念，又读了些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，卢梭《民约论》的译本，和李提摩泰的《泰西新史揽要》（十三年，我代理教育部部务，后藏班禅喇嘛来北京，我去访问他的时候，遇见了李提摩泰先生，他已七十岁左右了。）一类的书，不知不觉地非要打倒满州政权，建立民主国家不可，并且就想找同志了。

在同学里，和汤尔和杜士珍也基于这点上拜了把子，还想向求是书院里找同志。当时求是书院里有蒋尊簋、蒋百里、史久光、李斐然、周承蒞、许寿裳、钱家治等一辈，我们就想联络一起。后来二蒋都往日本学陆军，我们三杰（这是当时外面称我和汤杜的，因为我们在养正书塾里是特班生，我们和周继善、叶诚然、龚寿康联起来，又称六君子，这是同学给我们开玩笑的。那时距离“戊戌政变”不过两年，所以他们这样叫我们。）也决意待毕业后往日本学陆军，不想巴望得可以达目的时候，竟为了抱不平，帮同学，被学校除名了。

我的家贫，我们兄弟姊妹五个，依赖母亲十个指头维持生活的，这样一来，不但不能再进学校，也不能不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了，才跑到上海来帮助蒋观云先生（他的原名记不起来了，他是蒋尊簋的父亲）编辑《选报》。

那时（前清光绪二十八年），上海是维新派集中的地方，维新派是和平改革派，戊戌党人里“硕果仅存”的张元济先生就在这里，隐然是个龙头。革命党呢，露面的只有章炳麟先生。

蒋观云先生是维新派，《选报》不过选取各报里国内外的重要消息，加一篇论说批评批评政治，形式还是线装书。

我帮助蒋先生编辑《选报》不久，资方的赵祖德先生（他的别字和我相同，都叫彝初。见面我称他彝初先生，他叫我彝初兄，后来我才改为夷初。）想再办一个刊物，和我商量，就出了一份《新世界学报》，编辑写文的是我的老师（陈黻宸先生）和同学（汤、杜），不免要带点革命思想给读者了，但是真也“微乎其微”，因为刊物虽则办在外国的租借地的上海，刊物要公开地行销到内地去的，自然不能“畅所欲言”了。

这时，正是清朝的政治日见腐败，英、德、俄、法、日本等帝国主义在中国“为所欲为”的时候，因为庚子以后，清朝的帝、后和“权贵”都怕他们，正是“唯命是听”了。

但是，知识份子对政治改革的要求，日见强调，革命思想，灌输到知识青年，也像油在水面扩充不止，因为革命党在日本出版的鼓吹革命的刊物，在上海固然容易看到，内地也秘密输入的了。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行动，常常给人们不断地刺激。庚子年，唐才常弟兄在汉口起事被杀，〔唐先生弟兄死后，他的家属住在上海虹口什么路的隆庆里，他的大儿子唐麟（圭良）年纪比我小几岁，我们很要好。一天，他和我、杜士珍同往到他的家里，拜见了他的七十岁的祖父，这位老先生要哭不哭，一种说不出的悲惨样子，摩了圭良的头，（那时圭良活像一个寺院里小沙弥）托我们替他照管照管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。原来，圭良还有九十岁的曾祖母在上头，唐先生弟兄的死信还瞒着她的〕也给大家很大的冲动。在上海的维新派或革命派，除了文字工作以外，遇有外交上的事件发生，又是一个工作的机会。因为上海是租界，而前清没有治外法权，所以我们可以昌言无忌。那时，清朝虽则也有像胡适考据过的“校事”，却还不懂希特勒、墨索里尼的那一套，差了蔡钧做上海道，叫他来侦探革命党，结果，《苏报》的案子，还碰了一

鼻子灰。

我这时年纪不到二十岁，遇到法国对龙州，俄国对奉天这些事发生，张家花园（现在的泰兴路南段就是张家花园遗址）开会总去参加的。张园开会照例有章炳麟、吴敬恒、蔡元培的演说，年青的只有马君武、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。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，总是大声疾呼地革命革命，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，一到散会时候，就有许多人像蚂蚁附着盐鱼一样，向他致敬致亲，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，正像现在对民主一样。

后来，赵先生又别有企图，我们师生也各有各事，就散了。《新世界学报》也就中止。

汤尔和往日本学陆军去了，奉天事情紧急的时候，留学日本的学生“鼓噪”了，组织义勇队，要回国来，请愿和俄国开战，先派了汤尔和、钮永建回来，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申说意见。到了保定，见了袁世凯，世凯只给他一个电报看，他们的任务就终止了。因为清朝已得了报告，说他们是革命党，有密令叫袁世凯逮捕。当时，我在杭州，得到消息，尔和已被杀了，急忙打电报给杜士珍，叫他来商量，我们怎样去处分他的后事。又给袁世凯“幕府”里一位魏老先生去信问问情形，（这位魏老先生，是和林琴南翻译小说著名的魏易的叔父，也是尔和的长辈。）得他的覆信，说没有这回事。原来，他们想通过魏老先生和袁世凯说话，魏老先生劝他们快离保定罢。

我因家庭生活的负担关系，往来杭州上海，教书写文。那时，一位广东人邓实先生（别字秋枚，现在上海，年纪已七十岁了），独自办了一份期刊，叫做《政艺通报》约我写文。后来他更有兴趣了，又约我和我的同学黄节先生（别字晦闻，他们都是康有为的同学简朝亮的弟子，晦闻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授）办了一分期刊，名目是《国粹学报》。这个刊物有文艺复兴的意义，而鼓吹民族主义的革命很卖力气，居然风行一时，柳亚子、陈佩忍、章炳

麟、刘师培都是革命分子，（刘师培后来拜了端方的门，并且袁世凯想做皇帝，他竟加入了筹安会。）也先后加入写文。柳亚子、陈佩忍发起组织南社，做同盟会的外围，我也加入了。这时，我正学做诗，读了一本《孙逸仙》，就胡诌一首七律，现在只记得末了两句是：“一击满湖烟雨破，谁家天下举杯看。”因为在杭州游西湖船里做的，所以就把满湖两个字双关用了。

我是二十岁（前清光绪三十年）结婚的，那时，胆子却不算小，自己做了一副新房联对，现在也记不起了，末了大概是“卿桴独立鼓，我揭自由旗”。明年，汤尔和结婚，我送他一副新房联对，记得上联的末了是“快播革命种”，都在杭州裱画店裱出来，却没有遭到危险，因为当时没有特务。

以后，我在杭州、江山、诸暨、广州做了几年教员，在江山县立中学堂，遇到一件有关革命的案子。原来，江山是浙江边上的一个县份，在宋明的时候，文化水准还不错，到了清朝，乾隆以前，就科举考试的还不多，据说是因为“故家遗族”反对清朝的缘故，在《江山县志》上载到乾隆时候有一位姓郑的还为两句诗几乎灭族。这种历史的教育，到了这时，还有人接受他。

一位毛云鹏先生，是江山数一数二的读书人，他热心要办一个县立中学堂，和知县李钟岳商妥，把旧有的“涵香书院”来改造一下，这样，就得罪了地方上旧派里靠书院膏火（就是现在的奖金）补助生活的人。毛先生是有革命思想的，他在省城里买了些清朝皇太后那拉氏（就是西太后）皇帝载湉和什么什么妃子的相片回去，他偶尔在那拉氏的相片上写了《西厢记》里一句“我见了也消魂”，给他们设法拿走了，就告到县里，说毛先生是革命党，在皇太后相片上写这样的东西，便是“大逆不道”。

知县李钟岳是山东人，是个“忠厚长者”，做官也还不差。他晓得这里面的缘故，但是，案子太大了，他不容易明白地帮助毛先生，况且他的顶头上司衢州府知府是个满洲人，更使他棘手了。